



日本文学探缘

东瀛译丛

鱼返善雄 著
裴 蕾 译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东瀛译丛

日本文学探缘

鱼返善雄
裴蕾译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文学探缘 / 鱼返善雄著；裴蕾译.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8.5

ISBN 978-7-5474-2644-9

I .①日… II .①鱼… ②裴… III .①日本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31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05780号

日本文学探缘

责任编辑 秦超
装帧设计 王芳

出版人：李文波
出版发行：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http://www.hbcbs.com.cn>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0毫米×203毫米 32开 6.625印张 200千字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978-7-5474-2644-9

定价：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译者序

2017年2月，笔者经原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王铁钩教授指点，决定开始翻译鱼返善雄的《文学と東洋》（1961年由日本小峯書店出版发行）。原书名中的“东洋”所象征的是世界文学中的一个类型，具体表现为日本与中国典型代表的东方风格。笔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发现本书主要从文化、文学的角度论述了日本文学与中国古典的渊源，但又是非单向的影响，而是历史上中日文学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渗透。所以最后确定翻译后书名为《日本文学探缘》。

作者鱼返善雄（1910—1966）是日本语言学家、中国文学研究学者。出生于日本大分县。1926年始，在中国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留学，从事文学、语言学研究，1929年因病退学归国。

之后创作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语言、文化、文学类书籍。如：《大陸の言語と文学》（三省堂，1940），《新中国小説集》（目黒書店，1942，1948），《中国文学入門》（東大出版社，1951），《日本文学と中国文学》（弘文堂，1952），《中国的考之方》（宝文館，1952），《中国文学読本》（開成館，1955）等。

文学作为人类文化的一种形式，与文化范畴内的各领域息息相关，同时文学又具有特殊性。本书的作者以探究日本文学的特殊性为目的，从历代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两国文学的昔日起源与日后的分流发展，集中向我们展示了日本文学的前世今生。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中国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近代。由中国传入日本的汉文字已经融入成为日语的一部分，文学则演绎出了一番别样风光。而要了解日本文学，就绕不开中国古典文学。所以本书作者主要从日本人的视角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包括写作技法、思想情性等，以及“中华文物制度”在日本的传播、影响及内化发展。同时书中也论述了日本文学对中国近代文学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此外作者还从翻译的角度论述了中国诗歌对日本俳句的影响，以及作者的翻译理论在中国诗歌与日本俳句互译中的实际应用。

由于中日两国不论是在人种还是文化之间都存在着一种亲近感，这反而造成了一些错误的印象与想象。而作为昔日“东亚文化圈”核心的中国，如今对日本文学的探缘也非常有意义，

看看同一事物在不同时空映现出了怎样一番不同的风光与生命情性。即所谓“以彼观此，以此看彼，事物的如实才能得以彰显，己身的长短乃得以显现”。

本书之所以能够顺利翻译完成，得到了王铁钧教授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翻译的过程中，每每遇到问题，王老师都会通过邮件或者短信的方式耐心地解疑答惑。在此，笔者要向王铁钧教授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同时，笔者还要感谢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毛浩然教授、副院长黄文溥教授的鼓励与帮助。感谢郭惠珍老师、薛雅明老师、陈臻渝老师、陈延老师在翻译过程中给予的关心与帮助，以及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秦超主任的信任与帮助。

本人才疏学浅，如有翻译欠妥以致错误的地方，敬请赐教。

裴 蕾
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

2018年3月12日

序 言

人们通常倾向于将文学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联系在一起，或者干脆认为文学就是附庸于它们而存在，但事实上就文学本质的常识而论，如此论断显然有其逻辑上无法自洽的一面。从另一方面看，如此观点在对文学认知上流于狭隘与浅薄的同时，也限制并阻碍了文学的发展与进步。

从人类文化活动的历史来看，文学与政治、道德伦理，在概念上都是处于同位的关系，它们都从属于文化的范畴，都是人类文化活动不同的表现形式。在这一定位的前提下，凡此不同的人类文化活动表现形式相互影响，共同作用，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向上发展做出贡献。

文学又可以称为语言的艺术，这是因为文学的表现主要是

借助语言这一手段，当然这里所说的“语言”是一个包摄文字在内的广义概念，因此文学与语言二者并不存在主从关系或者谁附庸于谁的问题。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相对于文学的一般性，还要考虑基于民族、风土人情背景下文学的特殊性。我们作为同属东方文化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同时，我们又是以日语为母语的民族个体，如果只追求文学的一般性，而忘记了文学的特殊性的话，或许我们将永远无法认知文学的真谛。

鱼返善雄

1961年

目 录

译者序 / 1
序言 / 1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 / 1
传统与近代化 / 39
中国古典与现代人 / 54
孔子与论语 / 70
东方人的笑 / 80
阳间·阴间 / 88
中国推理小说 / 96
中国文学的发展 / 108
从诗经到现代诗 / 122
人生与诗歌 / 134

民族·语言·诗 / 142
中国的诗与日本的歌 / 146
流行与不变 / 160
对偶和押韵 / 175
野史小说和明治小说 / 183
日本文学对中国的影响 / 194
后记 / 198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

一 日中文化的基本认识

《圣经》中说：“神赐予人类一颗永恒的心，而人类却无法探知神之无限奥秘。”^[1]中国有句成语叫作“饮水思源”（即“喝水解渴之后要记住此水之源头”的意思），就文化的范畴而言，套用这一中国成语亦然，即大致可以说如果接受了文化的恩惠，作为接受者的一方，从情义上也应该要去寻找恩惠的源头。如此，一方面正如《圣经》中所说的人类拥有与生俱有的被上天赐予的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另一方面则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类对文化探知——包括其源头也包括其未来的流向的欲望与日俱增。

这一切都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人类在不同阶段探求的对

[1] 原文为：“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用，人不能参透。”《传道书》3：10—11

象也不尽相同。有一个词语叫作“孤独”，在彻底的孤独状态下，不必说一个人的社会生活了，就连生存都是问题。所以，作为个体的人自然是需要先建立起强有力的家族体系，之后再续家谱。但是如果把家谱追溯到神那里的话，恐怕就难以自圆其说了。所以往往是恰到其处地追溯到某个时点，即见好就收。凡此种种并非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有，在理性的学术研究领域也有此倾向。

日本民族在有历史记载以前就处在一种“岛国”的地理状态下。因此，在日本知识阶层的潜意识里，历来便有一种向亚洲大陆寻根溯源的传统，不管是从物质的层面还是从精神的层面。更准确地说，作为日本学术界这种传统的外向性的寻根溯源未必仅仅限于亚洲大陆本身，而是日本之外的任何疆域。当然，从研究结果来看，如果研究对象确实存在于日本以外的某个国家，此种态度尚可取，但是如果从一开始便刻意地采取这种态度，设定假设的话，尽管是无意识的，但作为学术来讲都是不可取的。

关于日本民族、文化的起源问题，日本学者的态度也有以上思想的成分吧。关于日本民族的渊源，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我认为任何故步自封、自命不凡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但是，另一方面，从近代科学各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来看，认为万事本源皆在外的想法也是错误的。众所周知，从人类文化史来说，在“近世”这一历史时期，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是连接在一起的。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出，现代日本人的直系祖先从几万年以前开始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了。原因是，从考古出土的绳文土器

时代^[1]以前的早期日本人所使用的石器工具，以及比绳文土器时代更早时期的原始人类生存形迹的发现都得到了证实。即便如此，早期即已生存繁衍于日本列岛的远古日本人的人种谱系尚未获得确认，也未见完整的血缘延续轨迹。但是，只要考古学发现的是几万年乃至几十万年前的人类骨骼，仅此就足以证明在远古时代，于今天叫作日本列岛的一方土地上就有日本人（曾经是日本人，姑且作此假说）在此生存繁衍。可以说，在这片气候、风土如此适宜的土地上，作为大陆的一角，便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文化。所以，当时日本与亚洲北部、中部、南部地区，或者与南洋曾经有过某种联系。日本人并非有意识地到达过波利尼西亚^[2]，或是以其他名称命名的太平洋诸地区。但是，在某种迁徙的过程中，确实有到达那里的人。这种观点总比那种认为日本人都是从外在区域“迁徙过来”的起源外在主义更有说服力吧。

在人类文化历史上，日本既然在近代属于亚洲大陆的一部分，那么与大陆之间就不存在从大陆迁徙到日本列岛，或者从日本列岛迁徙到大陆的说法了。这只不过是同一大陆区域的民族迁移或者文化交流罢了。其实是人类或者文化从南亚地区或者印度尼西亚经由中国南部地区迁移到日本、朝鲜。如果把人

[1] 绳文时代，是日本石器时代后期，约一万年以前到公元前一世纪前后的时期，日本由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土器”即陶器。

[2] 波利尼西亚，文化学和人类学上称作“波利尼西亚”。太平洋三大岛群之一，处于大洋洲境内。依据考古证据和比较的语言相同性之判断，专家们认为来自美拉尼西亚的移民在3,000—4,000年前定居于波利尼西亚中部。最早从东南亚迁徙而来。后来其中一部分的人群又向更遥远的波利尼西亚地区迁徙。

类历史比作帝国大厦的话，日本土器时代末期，即西方的希腊罗马帝国时期，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就像处于帝国大厦的三楼——人类历史的“近世”。来自朝鲜半岛的“渡来文化”对日本民族的再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对日语的发展也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这一观点无论是对民族学也好，对语言学也好，一时之间确实很难接受。

日本人就“我们从哪里来”这一命题，从出发点就持有偏见。为什么如此肯定地说日本人“是从某个地方来的”啊。诚然日本民族是一个混血民族，但是其混血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级别的融合程度了。据血液分析专家报告称，其混血程度绝不亚于中国的汉民族，甚至在其之上。中国汉民族和语言有着四千多年的历史^[1]，而日本民族和语言仅有二千三四百年的历史吧。在语言学界，甚至有学者认为在九千多年前，日本语就已经与大陆语系分道扬镳而别具一格了。如果不经历这么多岁月的话，即便是古典日语，要确立并稳固其语言体系，恐怕也是做不到的吧。现代日语从地理学角度来看，是采用了北方系阿尔泰语系与南方系南亚语系共存的状态。显然，如此的移花接木恐怕是为了令日语的语系有所归属而人为进行的撮合吧。

另一重要的因素是物质文化的迁移。虽然农作物与器具作为物证残存了下来，但是说它们是随着民族迁徙或者大量人群的迁移而移动的说法未免失真。就现代世界而言，人类的迁移并非是物质文化传播的必要条件，同时还涉及到急剧的时间变

[1] 此处论调认为这乃作者以及一些日本人的一己之见，他们认为汉文化最早是从商代开始的。

迁以及广阔的地域空间等范畴。富有文化创造才能的民族更是如此。既然承认一千年前的日本民族从极少数移民那里吸收了物质文化并使之改良发展，那么否定二千多年前的事实就很不自然了吧。

从以上各方面的分析思考来看，日本民族的大部分特色在考古学意义上的上古时期就已经存在于日本这片土地上了。我们姑且不争论日本民族是从原始时代就存在于日本的土地上，还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从亚洲大陆一步一步来到了日本，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日本民族同汉民族以及其他民族同时存在，而且在人类发展史上平等、独立地逐渐构筑了独特的文化。

二 日中文化的基本认识（续）

文化，其产生的历史时期是久远的，与之相比，文化的持续时间之长，影响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才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从此种意义上说，汉民族文化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印度等文化相比并无优劣之分。虽然我们无从知晓远古时代的汉民族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才得以形成，但毫无疑问的是，在人类历史上汉民族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他们在当时气候、环境并不理想的黄河流域定居下来，忍受贫苦，一年又一年顽强地成长起来。起初，他们只是在华北的一小片土地上经营着小村落，但不久便建立了覆盖长江以北地区的封建国家，随后发展成为横跨整个中国本土的伟大帝国。虽然在政治上重复了

几多朝代变迁，但汉民族却到达了南洋、美国等地域。领土远超欧洲的全部面积，人口急剧增长，以至于统计上出现了几千万人口的误差。

他们在至少三千年以前就开始使用独特的文字，这种文字不仅达到了完全适合汉民族自身语言特点的效果，而且他们还惠及周边民族，将这种文字传播到了没有文字的民族。在社会组织与经济生活方面，他们拥有足够丰富的经验和极好的预见性，同时为了抵御外敌侵略，他们又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除此之外，更加具有特色的是他们拥有自己独立的道德伦理价值体系，拥有《经》《史》《子》《集》四大文献总纂。这些都是日本人所谓的“东洋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汉民族，就算是中国疆域内的其他少数民族从外表上看也是黄皮肤的“黄种人”。就这一点，对日本人来讲首先就具有亲近感。另外，不管是否全面，因为两个民族使用共通的文字，所以经常使用“同文同种”的口号。日本主要是从隋唐时期开始与中国进行交流，引进中国先进的艺术、宗教、制度等并加以创新，所以会有一种文化亲属关系的意识，这是某种与对待西方诸国所不同的感情纠葛。元朝时期的中国是日本恐惧的对象^[1]，明朝时期的日本却是令中国头痛^[2]的

[1] 1274年，忽必烈派出九百艘战船三万以高丽兵和汉人为主的人马，出征日本。元军在九州岛登陆，遭到日军顽强抵抗。元兵无法战胜日军，只得退回船上，谁知夜来狂风，元军战船纷纷沉没，元军逃回。

[2] 早在明朝初年，日本倭寇就经常袭扰我们的海疆，为此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可是头疼不已。根据历史记载，在洪武时期倭寇入侵达44次之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朱元璋可谓殚精竭虑，绞尽脑汁。

原因，而这一切都已成为了历史话题。共和国时代的中国人反思中日甲午战争，这一场失败至少唤醒了中国人。发起侵华战争到远东太平洋地区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头目们认为，只要向中国再输入“东洋文化”的精髓思想——儒教伦理思想的话，中国人就会无比感激他们。事实却是，儒家思想对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民众来说，只不过是用来装点门面而已。而对于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这些恰恰正是他们抵制的腐朽落后的东西。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以前认为，日本人只不过是会耍手段的暴发户，只不过是传播西方文化的买卖人，只有极少数的慈善家会思考日本固有的、独特的文化。大部分中国年轻人只是因为无法实现去欧美留学“镀金”，而选择到日本留学“镀银”。那时由于日本学校强行将严苛的“忠君爱国”的教育理念灌输给这些年轻人，他们日后竟成了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另外，当时留日的中国年轻人当中很多人娶了日本女人为妻，而日本人娶中国女人为妻却极其稀少。两种现象虽形成鲜明对比，然而中国人却很难说清楚到底对日本女人哪一点感兴趣。

正如在国际交往中司空见惯的一样，日本与中国在过去的接触中，由于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和互相理解不够充分，而不断上演着历史的悲喜剧。可能也正是由于两国之间共有的外在与内在的亲近感，反而造成了互相之间的错误印象。若要中日两国人民互相尊重历史与现状，并达成互相理解，其中的难度要远比对西方人困难得多。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本应该有着互相理解的友好关系，但是由于彼此过于自信，又不互相学习，导致了误会不断加深。